

评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谢毓洁

(苏州大学 历史系,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以“求强”、“求富”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涌现了一大批提倡学习西方的洋务派。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也融入其中。郑观应是改良主义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不仅影响深,而且流传广。“商战”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充满浓厚的实践色彩。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F129.52;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94(2002)02-0082-02

On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f Commercial Fight

XIE Yu-jie

(H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Jiangsu, China)

Abstract:In the 60's-70's of the 19 century, there appeared the movement of Yangwu in China, which concentrated on the issues of "Becoming Stronger" and "Becoming Richer". A number of members of Yangwu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The early reformis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movement. ZHENG Guan-ying was one of the reformists and became outstanding and his thought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still popular now. "Comercial Fight" was the center of his economical thoughts which was very practical.

Key words:ZHENG Guan-ying;commercial fight;thoughts;practice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完成工业革命。为了满足商品生产与流通的需要,他们纷纷在世界各地寻找商品原料产地与销售场所。在瓜分完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印度等国后,他们将贪婪的目光瞄准了中国。处在闭关锁国、封建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在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被迫打开了国门,一时间,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沿海及内陆省区,逐渐瓦解着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波及城市手工业、商业。这一状况引起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派仅仅效仿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商务管理与经营,以求富强。与此同时,在外国企业与洋务企业的刺激、示范、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与本国封建主义的排挤压制下,它呼唤、催发着服务于自己的经济思想,郑观应就是它们的代言人之一。

郑观应(1842—1921),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曾为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的买办,后得到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赏识,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湖北汉阳铁厂、商办粤汉铁路公司任总办、帮办等职务。他先后共作了二十多年的买办,同时又自营企业,参加洋务派企业的管理是以商股代表的身份。他是一个由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家。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既有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实际经验,又亲身执掌洋务企业的经营事务。这些必然使他的经济思想先进且富有实践色彩。“商战”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

如早期许多改良主义者一样,郑观应也注意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长期处在贸易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的人超境地。他发觉西方商品倾销不仅限于鸦片,还有棉布棉纱,大量生活用品等。“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言析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耗银三千三万两。一则曰棉布棉纱两种,每年耗银五千三百万两……不知鸦片之外,

更有杂货,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1]他认为,面对西方商品的倾销,仅仅凭借出口传统的丝、茶等不能轻易扭转贸易入超的形势。况且日本、印度等国的丝、茶出口业又冲击着中国的丝、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郑观应指出,要想改变贸易颓势,“吾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2]“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拮据蔽国无形。我之商务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3]采取“商战”,改变贸易颓势,振兴富强中国,在郑观应看来,不仅仅是口号,必须付诸行动。他提出许多具体的、可行的商战内容。如丝、茶、鸦片、洋布、诸用物、零星货物战,开煤矿,自制铸金银,展开货币战等,涉及国民经济的众多生产领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鸦片战中,并未提出禁烟主张,而是自种烟土。显然远远落后于林则徐等人的思想,也体现郑观应的买办性。他的思想并未深入,只简单地以为振兴民族经济,与外商展开商战获胜便可,但也忽视外商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勾结,排挤打击中国民族经济,以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阻力。值得肯定的是,郑观应提倡商与工结合,工艺精巧使“拙者可巧,粗者可精。”这样就增强了与外国商品竞争的能力,不仅仅是土货而已。如何提高工艺精美度?郑观应主张采用机器制造,他例举在丝织业、纺纱业等行业由于西方用机器生产,其产品远比中国用手工生产出来的货物要精致。所以中国要想增加货物出口,行销欧美,必须要采用新机器、新工艺。然而“人但知购买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只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妙用也。”^[4]这体现郑观应比同时期改良主义者经济思想的高明之处。他深感中国在向外国贸易过程中,饱受盘剥,受制于人。于是主张自制机器,发展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客观上有利于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郑观应因为长期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任职,深深体会到国家辅助对商战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遣也,领事为商也,兵

收稿日期:2002-03-04

作者简介:谢毓洁(1977—),女,安徽全椒人,苏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船为商事也。”不仅如此，“国家不惜重资，备加保护商务也。”^[1]另一方面，他谴责中国“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自要，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势取，即以术夺。”^[1]面对这种情况，郑观应提出“护商”要求，“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恃，而工艺之兴，尤笔藉官力为振作。”依靠“官力”、“官权”，可减少封建官吏对企业的敲诈勒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业发展。这一思想无疑体现郑观应对封建势力的依赖心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发展缓慢，力量薄弱的民族企业不得不从实际考虑，投靠官府，借助他们来获取继续发展的空间。郑观应以日本为例，多次谈及日本效仿泰西，辅助工商，政府全力支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经过数年便经济大有起色。可见郑观应非常希望清政府学习日本政府扶助工商，而不是处处压制，窒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郑观应的护商要求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是设商部。在传统六部之外增设商部，统领商务，协调各部门生产经营关系，有效组织各行业商务活动。由众人推举有才能、有实践经验的人任商部局董。郑观应本人就担任过局董，履行统一管理的职能。其次，立商法。郑观应以为要想有力促进商业发展，就应该修改不利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减轻商人的负担。他注意到外商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享受许多中国商人没有的特权，往往在竞争中占上风。因此，郑观应呼呈政府用重税保护民族工业，而不是仅仅“值百抽五”的税率。但是，他在提出立商法的主张时，笔墨多着重于立法的重要性，很少关注封建行会行规对民族工商业的遏制，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长期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而且他也忽视了正是清政府造成了西方国家享有大量特权，在中国形成洋货泛滥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只是在旁枝末节上修修补补，实际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空间也不会因此而扩大多少。何况在赫德已把持海关的前提下，重税的提法显然也不可能实现。这就暴露了郑观应的思想局限在具体的措施上，而缺乏全局性的思考。再次，郑观应提倡设商学。他批评那种认为商学是简单贸易的思想，指出“商务极博，商利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1]他同时发现“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上，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伍。”^[1]一方面是商务的复杂精深，另一方面是士大夫不屑从事商务，面对这种情况，设立商学势在必行。唯独如此，才会教育聪明才智之士成为商业人才，在商战中纵横驰骋。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反复阐述发展商业在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性，以纠正士大夫们的偏见。他再三举日本为例。日本从以往的弱小之国一跃成为可与中国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国家，正因为他重视工商业发展，借此激发爱国人士的投身商业的热情。郑观应挑时格致之学是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在谈到工、商结合，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中，他就注意到格致之学的重要。他不仅道明事物发展的道理，更道明事物为什么发展的道理。将格致之学运用于工商业，会有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郑观应注意到，在中外通商中，中国只会出售传统的未加工的原料产品，而西方国家能用技术加工原料，转卖于中国获取利润。可以说，他是较早意识到发展技术重要性的先知先觉者。他反对不加分析地简单效仿西方，而是主张有创造性的，不脱离中国生产实践的学习。他的得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意为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交通设施，发展有创新的技术，三者结合，则可在商战中一领风骚。郑观应眼界宽广，深谙西方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所以他提倡在中国进行的商战，多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的改良主义者行列中，独树一帜。

郑观应是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人物。他的《盛世危言》一版再版，行销到朝鲜、日本等国，反响很大。他所提倡的“商战”思想，其目的是要振兴、富强中国。由于他本人的经历，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认识更清楚，他所提出的各种“商战”方案无疑更具有可行性，即“实践”色彩浓厚。这种注重可行性的趋向体现在他的理论中，也暴露出他的理论并未形成体系，多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而作，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地探寻西方经济发展的规律。

郑观应曾说“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从这句话可看出他的思想也有爱国主义精神。19世纪中晚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恶化，引起不少改良主义者的忧虑。不少人都想方设法，提出各种方案以求改变这种劣势。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外国商品输入狂潮，他们要着手解决的是，增加中国商品的出口量。郑观应的“商战”却是从商业角度抵御外国入侵“……由于在那个时代国民生生产大部分还处于封建形式中……”^[2]因此，他的“商战”思想，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自然而然地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在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中，不胫而走。虽然它有着很明显的缺陷，但它对于洋务派仅重“兵战”，不注重发展中国自己工商业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盛世危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2]马克思恩格斯(第十三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赵靖，易梦虹.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 周运清)